

窗下写穆时英，越写疑云越多。惴惴不安的给穆时英的小妹穆丽娟打电话。我说，穆阿姨，请您吃饭。中餐还是西餐您定。穆丽娟阿姨那知道：“不要出去吃，我在家里请你吃，我年纪大了，弄不动了，就做点家常菜。”怎敢惊动九十五岁的老人？坚决不同意。那边，穆丽娟柔声道：“不用客气，我是把你当自己人的。”随即约好时间，雷打不动。

清水红砖石库门。穆丽娟住两间厢房，双阳台，南北通透。邻居家的白猫，赶也赶不走，因为这里阳光独好。

地板还是最初的美国家枕木，洗刷得泛出白木芯子。五斗柜上，一把红色康乃馨，是早上刚买来的。

开饭了。

素鸭，白斩鸡，青豆虾仁，清蒸鳊鱼，素什锦，蛋饺木耳汤。

和所有的上海人家一

作家堆里的美女

淳子

样，一桌子的菜，可还是一叠声的抱歉道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小菜，怠慢怠慢。

后来知道，这一桌菜的食材，都是穆丽娟一早起来，去菜场买来的。

一顿饭，吃了两个小时。

福建保姆道：“你们好像在采访？”我道：“对呀，是采访。你好福气，在这样的人家服务。穆阿姨一家都是传奇的人物。”

保姆受到鼓励，去里间拿出厚厚的相册道：“难怪哦，个个都长得好好美。”

一张一张翻阅——

穆丽娟与戴望舒的结婚照。穆丽娟与第一个女儿的合影。香港别墅前，和作家、画家叶灵风之妻赵克勤的合影。一件紫色旗袍，肋骨三角区一朵镂花。穆丽娟灿烂的笑，下意识的用手去遮拦，恣肆里，留下淑女的克制。

少妇的穆丽娟，发髻间一朵绒线白花儿。嘴角轻轻抿着，眼角划过一丝忧伤。这是在服孝，为母亲，为哥哥穆时英。这一年，穆丽娟站立在人生的悬崖边。

饭后，端上水果。穆丽娟拿一把剪刀，在桔瓣的腰枝部位破一个十字，轻轻一扯，橘子的衣钵滑落，橘瓢花朵一般破墙而出，她这样一瓣一瓣地吃桔子，好比小女子绣花，一点也不着急。

着什么急呢？都是好日子，不着急的，慢慢过。

穆丽娟出生富裕人家，杨柳细腰，婀娜恬静，生性纯良，哥哥穆时英是著名的新感觉派作家，第一任丈夫是家喻户晓的雨巷诗人戴望舒，第二任丈夫是才子型学者周黎庵。从小在才子佳人的沙龙里闲庭信步，在学校，读书好，品德好，人长得好，被捧为校花。

1935年4月，戴望舒从法国返回上海，与刘呐鸥、穆时英两家同住在虹口。房子是刘呐鸥的。彼时，刘呐鸥已开始投资电影。

穆丽娟在报纸上看见电影公司招聘演员的广告，烫了好莱坞的明星头，换上旗袍，在照相馆拍了一张颇有阮玲玉架式的风格照，按照地址寄出去。没有下文，久了，也就忘了。一日，上楼去玩，刘呐鸥夫人从抽屉里拿出她的照片，笑吟吟地还给她。原来，她报考的正是刘呐鸥的电影公司。电影公司征求穆丽娟母亲的意见。母亲自然不同意。于是穆丽娟的明星梦就被锁进了抽屉。

此时，戴望舒正处在失恋的绝望癫狂之中。大家都很同情他。穆时英说：“你不要灰心，她算什么，我妹妹不比她漂亮？”经过大哥的介绍，穆小妹认识了这位有才气的大哥哥。

1936年6月，19岁的穆丽娟嫁给了比自己大13岁的戴望舒。1939年，抗日战争最严峻的时刻，戴望舒带着妻女乘船去了香港。

做了母亲的穆丽娟逐渐

载着吉隆坡的客户到北部，一路上的稻田风光竟叫他傻了眼。

那么宽阔的绿色，一望无际，深碧浅绿的一田田风景，我很少看到。他的手机瞬间转变为相机，不停拍摄车外我眼中的老风景，却是他眼里的新鲜美景。

同是大马人，生活在中部的朋友，平时没有机会看到稻田景色。

太漂亮了！他说。

太漂亮了！他重复。

不只是车子往北上开的时候他说，回来的路上，对着夕阳余晖中闪烁发亮的黄金稻田，他没有停止赞赏。田野中远远的小木屋，阡陌间排成队伍的高耸椰树，几个小孩在稻田中玩水，你看你看，还有人在稻田中钓鱼呀！



他把路上的风景通通读给我听。

对他而言，这些都是稀罕而新奇的景致。

犹记得表哥要移民新西兰以前，先到那儿探看。

回来以后，他说当地的旅游巴士司机问他：“这里的风光很美丽吗？”

原来巴士司机每天开车都听见到访游客的赞叹。

漂亮极了！美丽极了！好看极了！

车上的游客且不停地按着相机，深怕美景在瞬息间消失，紧张兴奋地非得拍下来带回家。

每天都在美丽风景里行走的司机，他眼前那翠绿的田野和青碧的草原，姹紫嫣红地绽放盛开的各种鲜花，对他也不过就是平常普通的日日景色。

风景再美，天天对着看，日久也会产生审美疲劳。

倘若以游客的心情和眼光来面对每一天，观看周遭景物时，生活可能会有新的体会和不同的感觉。

现在开始试试。

有了自我独立的意识。她觉得自己就像《玩偶之家》中的娜拉。丈夫海尔茂自认能搞定妻子的小脾气，但再天真的娜拉也有长大的一天。穆丽娟对戴望舒说：“你再压迫我，我就和你离婚。”

1940年6月，穆时英被刺杀身亡，戴望舒不许穆丽娟回沪奔丧。几个月后，母亲也去了阴间。戴望舒又扣下了报社的电报。

曾经雾里看花的穆丽娟，一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明白了这个婚姻。

穆丽娟道：“我们离婚的原就是因为性格不适合。”

第二任丈夫周黎庵，英俊魁梧，一支雪茄衔在指间，电影明星的范儿。

“穆时英、戴望舒他们写东西要琢磨推敲很久，写写停停，但是周黎庵下笔如有神助，流水一样，一气呵成。”穆丽娟如斯评价第二

任丈夫。她爱他。

周黎庵老了，病了，不愿去医院，躺在床上，一本唐诗相伴。他拉着穆丽娟的手道：“你随便点一首诗，我背给你听。”他最后时光，就是这样消磨的。

“他对我真的很好很好。”穆丽娟道。忽听得楼下有人喊：“穆阿姨，下午来搓麻将。”



上海戏剧学院一角 (油画) 孙志奎

本文题目所指有人不知职称，是说这人不为职称所累，对职称应有而不去上心，犹如不知。这个人就是昔日燕京大学研究生，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。

事情发生在1935年。是年周一良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，留校读研究生。读研期间，他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程。周听陈先生的课顿觉自己“眼前放一异彩”，从此对陈先生“佩服得五体投地”，并下决心要像陈先生那样治学，尤其是治魏晋南北朝史。由于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，周一良得以拜识陈先生，且受到后者激赏。第二年，尚未从燕大研究生毕业的周一良，便由陈先生推荐，进入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创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。王世襄先生曾在《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》中写道，1943年冬天，他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介绍，想进入傅斯年任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（即中研院史语所）工作。傅斯年一见到他便问：你毕业于哪所大学？王答：燕京大学国文系。傅当即回道：“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工作。”这话出自王先生本人笔端，应该不谬。如是看来，傅拒绝王理由显然是遁词，因为此前同样来自燕大的周一良就进入了史语所，且受到傅的真切欢迎。显然，在傅斯年眼里，已写出《魏收之史学》的周一良，分明更符合傅早在史语所创立时便高调宣称的，该所要“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”的宗旨。而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年的王世襄，傅觉得王离这个标准相去甚远。只是周一良加盟史语所，傅斯年高兴之下，也很无奈地告诉周，因眼下无职称缺额，周进入史语所，暂且只能给他“图书员”的“职称”。不过傅向周表明，这并不会影响周在史语所自由研究魏晋南北朝史；史语所也不会给周定硬性成绩指标。傅对周说，你什么时候写出有质量的文章，都可以在《史语所集刊》上发表。周一良明白了，史语所一时无法给他相应职称，但可以提供给他在学术殿堂里自由翱翔的广阔空间。而这恰是周梦寐以求的。在周看来，能涉足史语所这方学术平台，是他人生的机缘，远比职称重要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周一良在史语所不仅沉潜于魏晋六朝典籍，还精读《宋书》，并涉猎《资治通鉴》《金石萃编》及清人钱大昕的《廿二史考异》、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等，终于在学术研究领域日臻化境。其间他还时时得到在北平的陈寅恪先生的指教，后者不时将随时想到的见解和产生的想法，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，有时他一天竟会收到陈先生寄来的多张明信片。周一良也不负陈先生、傅先生所望，仅这一年，他就写出三四篇高质量学术文章，其中发表在权威的《史语所集刊》上的《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》一文，让陈寅恪先生“深为倾服”。不妨设想，假如当初周一良计较于职称，惟职称是重，因此与史语所失之交臂，又岂会有这一年的收获和日后的成就。由是观之，周的不知职称，这“不知”实乃一种大智；大智若愚，这恰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学人的绝顶聪明之处。

陆其国



异乡人

(德) 林中洋

名,字是唯一会华语的奶奶写的,但是她只会说闽南话,所以莫妮卡很想知道,这些名字用普通话怎么念。我接过纸条,看见上面中规中矩地写着四个人的名字,繁体字,可以看出写字的人态度很认真。我一边念这些字,一边把拼音写在下面。莫妮卡在一旁看着我,情绪有些激动,她告诉我,她还在印尼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,中文是被禁止的,不仅学校里不许教授中文,而且在家里也不能讲,所以,她对自己祖先的语言一无所知。

像莫妮卡这样不会讲华语的印尼华裔不在少数,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,尤其是“九·三〇”事件之后,印尼政府全面禁止中文的传播与使用,这项禁令一直到1999年,瓦希德执政之后才被解除。所以,四十五岁之下的印尼华裔不会说中文是很普遍的现象。

既然话题谈到了排华,我小心翼翼地问起了“黑色五月”,在座的几个印尼学生听到我的问话,有些犹豫和为难,当我正在为自己的莽撞而后悔的时候,马琳达开口了,她说,1998年的5月14日那天早上,她正要出门,就有朋友打电话来,叫她呆在家里,哪里都不要去了,外面很乱,华人在街上被殴打,华人店铺被抢劫甚至焚烧,特别是华人妇女,更是被袭击的目标。所以,作为女子的马琳达,在家里关了十几天之后才敢在别人的陪伴下出门,还好,一个月之后,她就得以离开印尼,飞往德国。

我听到这里,心情也变得很沉重,这时,另外一个印尼女孩满再说,她也是1998年离开印尼的,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,言毕将眼睛移向窗外,但是我仍然可以看见她眼底浮上来的淡淡的泪光。

那天下课之后,在回家的高速公路上,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。虽然我也生活在异乡,但是在我的意识里,“故乡”的概念是很清晰的;在身份认同上,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中国人;可是,对于我的印尼学生们,这个问题好像就没有那么简单了,他们好像从未真正属于某个地方——在他们生长的国家,那个可以被他们称之为“故乡”的地方,他们不被真正接受;而他们的“祖国”,于他们却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国度,他们还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,也不会说中文,如果说自己是“中国人”,仿佛非常勉强。那么在德国呢?他们和我一样,都是外国人。

看待一个人当然不能只看他的种族或是国籍之类的外在标签,但是对于个人而言,这些却是我认同的一个部分,因为这里面包括了文化、血缘、回忆与成长。故乡就算再遥远,也是游子心中永远的根与思念。也因此,一个人如若没有一个可以被当作“故乡”的地方,就仿佛风筝断了线,飞得又高又远,却又无依无靠。

德国的浪漫主义有一个典型的特征,就是到别的地方去想家。我也是走得远远的,然后才尝尽了乡愁的滋味。现在我才知道,有家可想原来是一件幸运的事。

癸巳年新春联

爆竹声中,壬辰龙年夭矫而去,癸巳蛇年蜿蜒而来。

龙蛇飞动之际,神州大地生机蓬勃,一片繁荣景象。中华人民豪情无限,面对锦绣山河,正满

陈以鸿

怀信心地创造并享受着美好的生活。更向前看,又将是万马奔腾为标志的甲午马年。兴奋之余,作癸巳年新春联一副——

龙蛇飞动山河壮, 骥骏奔驰道路宽。

饭店突破古都城市轮廓线特征,成为长安街上高层建筑的始作俑者,到236米高的北京电视中心,再到现在330米的国贸三期,古都的天际线和景观完全被破坏。

新的建筑开始挤压北京城内传统建筑,一些新建筑本身就是胡同和古建的废墟之上建成的。“城市是文化的容器”,这是刘易斯·芒福德的名言。毫无疑问,北京曾经是盛纳中华文化最丰厚的“容器”之一。然而,容器破了,残留的味道还能闻多久?

福州三坊七巷被誉为“明清古建筑博物馆”,是我国东南现存

最大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,这里汇集了包括林则徐、严复、邓拓、冰心等众多名人的故居,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商业开发开始光顾这里,一些古民居被拆除,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十余层高的商住建筑。

估衣巷被称为津门第一街,但这条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仍然难逃改造命运,尽管有众多人士在拆迁前为保卫老街做出了诸多的努力,但它再也不能恢复从前的模样。

在古城西安,除了城墙还保留得比较完整,城内的建筑与格局早已经完全改变,即便在城北化觉寺古城保护区内,传统民居

也是数量寥寥。……

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,还不仅仅如此,建筑只是文明的一个表现,却能反映出中国文明的漏洞!

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,“中国传统文化”的发展一度几乎停滞不前。为了跟世界接轨就有必要丢失自己吗?

阅读建筑,阅读经典。中国!发展了五千年的文化大国,在越来越凶猛的外来文化中如何保护自己?我们真要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,因为消失的文明难以重建,有多少文明可以重来?

十日谈

阅读经典

春节即将来临,明起请看一组《办年货》